

潜明兹

自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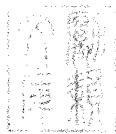
潜明兹 著



自选集系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自选集系列

潜明兹

自选集

潜明兹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潜明兹自选集/潜明兹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励耘文库.自选集系列)

ISBN 978-7-208-06892-6

I. 潜… II. 潜… III. 民间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7.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28851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石楠

装帧设计 王小阳



世纪文景

潜明兹自选集

-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 出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 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 开本 635×965毫米 1/16
- 印张 27.25
- 插页 2
- 字数 341,000
- 版次 2007年4月第1版
- 印次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
- ISBN 978-7-208-06892-6/C·271
- 定价 40.00元
-

总 序

木铎金声，中文百年。早在1902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创建之始，“国文”便被列为学科建制的首要门类。1908年，师范馆独立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延聘的教师多为晚清著名的经学大师。1912年，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改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设立了国文部和国文专修科。1923年，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改国文学部为国文系，并增设了国文研究科。及至1931年，北平师范大学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合并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之后，又建立了文学院，下设国文、外文、历史三系。

历经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北师大中文学科广揽英才，一时风云际会，鸿儒咸集，不仅成为全国中文学科教学与研究的中心之一，也跻身于中国近现代文化与学术思想重镇的行列。

大学乃大师之谓。百年以降，不胜枚举的大家名师荟萃北师大中文学科，杏坛执鞭、弘文励教。昔有鲁迅、钱玄同、刘半农、黎锦熙、沈从文、沈兼士、顾随、余嘉锡、吴承仕、黄药眠、钟敬文、谭丕模、穆木天、叶丁易、刘盼遂、李长之、李

何林、陆宗达、萧璋、俞敏、启功诸先贤会通开新，彪炳史册；今有郭预衡、聂石樵等一大批学高身正、享誉学界的后继者笃信精勤、蹇翻远翥。这些上下求索的前辈学人，不仅用智慧与辛劳、学识与著述，也用他们的人格与情操，共同铸造了北师大中文学科的百年辉煌。

学术当为大学的“立身之本”。北师大中文学科之所以常葆生机，与其自觉的学术追求不无关系。上世纪30年代，北师大成立国学研究所，时任文学院院长的黎锦熙先生就曾中肯地告诫道：大学者，具有创造力之学府也，学术实乃师大之生命线；倘若学术不兴，则师大终将不能成其为“大”。

近现代时期的北师大，其学子多出寒门。生活上清贫朴素，学业上质朴自励，刻苦攻读、勤奋治学、务实严谨，蔚成风气。北师大过去曾有四字校训，曰：“诚”、“敬”、“勤”、“朴”。诚笃力行谓之诚，敬业乐群谓之敬，勤勉奋发谓之勤，实事求是谓之朴，精辟概括了北师大一以贯之的学术风气。而其中，“诚”、“朴”二字，更是百年师大中文学科学术传统的生动写照。

笃实求真而不务虚华，质朴勤勉而锐意进取；朴学与创新兼容，学术与思想共济；既捍卫学术家园，又保持现实关怀；既恪守育才与“树人”之宗旨，又积极担当中华文化建设之大任。百多年来，无论遭遇怎样的困厄，无论历经怎样的变迁，北师大中文学科以“诚朴”为核心的学术传统始终不曾断绝，薪尽火传般代代相承至今。

当今时代，经济体制的转型导致人们从生存方式到思想观念的急剧变化。大学在迎来空前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身处精神追求有可能被物质欲望所“悬置”的社会文化语境，失去轰动效应的中文学科，不得不面临一连串严峻的话题——中文学科的发展，如何面向当今的时代？与时俱进的革新诉求，如何不被浮躁、功利的世风所裹挟？“诚朴”的学术追求与引领社会文化的重任，如何在喧嚣中传承、坚守？

有鉴于此，北师大文学院的《励耘文库》出版了这套自选集系列丛

书。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可视为北师大中文学科的前辈学人们对上述问题做出的回答。丛书作者均为本院成果斐然、卓有建树的专家教授。这些现已离退休的前辈学人孜孜程程、忘我耕耘,用数十年如一日的清苦与执著诠释着“诚朴”之精义,为北师大中文学科的发展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丛书所收录的论文,均系作者自选的代表性作品。这些写作于不同时期、关注不同论题的学术文字,不仅是对作者学术生涯的一次欣然回顾,也以浓缩的方式集萃了作者精深的学术思考和卓著的学术成就。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篇篇浸透着学识、睿智、思想与操守的文章,负载着传承百年师大优良传统的使命,见证了当代学者难能可贵的历史责任与学术情怀。

这套丛书建构了一方精神守望者的家园。在这里,一群甘于寂寞的思想者,用执着与静思来面对飞逝的岁月和骤变的时代。他们身处喧哗之中,追求的却是潜心向学之中心灵的沉静。他们或许没有显赫的声名和地位,但他们却享受到了精神的富足。作为百年师大中文学科悠久学术传统的又一批“代言者”,他们以其传承和光大中国文化的热望,以其诚信质朴、不懈求索的精神,为后学者树立了治学与为人的楷模。

先师鲁迅尝言:“人多是‘生命之川’之中的一滴,承着过去,向着未来。”在文明传承和学术进步的链条中,这套丛书的著者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一代学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是为序。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 张健

2006年7月7日

目 录

献给我的上帝（代序）	1
社会主义民间文艺学体系的形成与趋向	5
神话的起源	17
神话与原始宗教源于一个统一体	28
略论中国古代神话观	40
神界是人间的映象	73
从祖先崇拜到上帝的出现	79
龙——蛇论	90
儒教之神	106
从萨满教神话窥其生命观	119
从盘古神话到盘古文化	
——兼论盘古盘瓠的古史史影	136
去其污垢，还蚩尤本相	154
台湾神话学暨两岸文化的同源一体	169
神话学在中国	190
当代神话学的勃兴	201
评顾颉刚的古史神话观	220
评顾颉刚的孟姜女研究	237
英雄史诗简论	257
佛教文化与中国英雄史诗	279

《格萨尔》的宗教幻想与艺术真实	290
从《格萨尔》的巫术层次窥其艺术民俗	308
《格萨尔》与《罗摩衍那》比较研究	319
无情未必真英雄	
——《玛纳斯》情结	337
从比较史诗学看中国《玛纳斯》的艺术层次	350
试论傣族英雄史诗《兰戛西贺》	
——兼论《兰戛西贺》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关系	362
传说的审美特征	385
“三言”的美学理想	402
关羽在民间	417

献给我的上帝（代序）

我们这一代人，凡是没有背景的，大都难逃分配定终身的命运，我自然也不例外。大学毕业服从分配，导致终身从事民间文学专业。志趣与现实需要的矛盾，在我身上冲突了20多年。人们的逻辑很简单：国家培养你专搞这个的，你不干谁干。工作之外，我一般不读专业书，但不等于不读书，从哲学、历史到文学，从古到今，从中到外，广泛地读，认真地读，还写过不少学习心得。这种不务正业的“用功”，为我后来“浪子回头”搞专业打下了一些文化基础。

上世纪80年代初，转来转去，转不出民间文学，不得不铁下心来干。因此我进入研究状态很晚，1979年算正式进入角色。

搞民间文学，迎面而来的首要问题，是对其定位。民间文学是什么？有人说，民间文学是科学；民间文学有多功能性，应正名为民间文化。开始，对此说未在意，因为民间文学是文学，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不管民间文学多么特殊，它仍属于文学的范畴，因为它跟其他文学样式共同的一点，都是通过艺术形象影响受众。优秀的作家文学都有文化史价值，也程度不等地存在多功能性，但绝不能称其为文化史著作，或别的什么人文科学著作。对民间文学亦应如是观。

研究民间文学的理论是科学，是独立的新兴学科。一门学科没有独立性，很难发展。说民间文艺学是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也不对。我国民间文艺学是社会主义文艺科学的组成部分。民间文学曾经与民俗关系十分密切，一直被传统民俗学视为民俗的部分。学科的发展，是不断分化、整合，再分化、再整合，螺旋形上升，其目的不是为了某一学科兼并另一学科，而是发展新学科的需要。民间文学早在上世纪中期已

从民俗分化独立,有什么必要再走回头路?实践证明,民俗学兼并民间文艺学以后,再次使民间文学丧失了独立性,它的发展已很受局限。一门本来就发育得不是很成熟和健全的学科,面临消亡的危险。民俗取代民间文学;民间文化取代民间文学;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课由必修改为选修;民间文学教研室被取消;专业理论刊物鲜见民间文学研究论文。民间文学果真成了可怜巴巴的资料。

当然,也应该承认,民间文学确有不同于作家文学的特殊的艺术性,审美性、愉悦性、娱乐性、观赏性……即使最原始的民间口头文学,依然有原始的美、拙朴的美,甚至宏伟的气势。到封建社会中后期民间无以数计的长歌短曲,更是优美绝伦,一唱三叹,情动于衷,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令人不能不叹服,抒情的天才在民间。

运用不同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本来可以并存。不能容忍不同的艺术观点,恰恰是缺乏自信的表现。由于我长期所受教育与社会影响,我更看重民间文学的文学价值,但我并不反对从其他角度去接受和研究民间文学。我所理解的多角度,乃是从事不同专业者各有侧重。我的多角度是为我的文学角度服务的,不能取而代之,更不能喧宾夺主。我以这一理念为指导,对史诗、神话、传说的美学价值和艺术性都作过探讨。与此同时,我也借助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成就以加强研究的深度,并逐渐扩展到民间文化。而对民间宗教的研究,更是我长期研究民间文学的必然延伸。

我的学术观点并非固定不变。在注意调整自身知识结构的同时,不间断地向同行学习。比如袁珂先生提出“广义神话说”时,开始我也是反对者之一,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发现他的理论中有一部分是可取的,并据此进行了有关儒教与儒教之神,以及关公文化的研究。又如我在研究神话之始,对传统的神话历史化的观点深信不疑。随后,我发现此一理论有很大的缺陷,极易导致对古史的彻底否定,可能陷入“古史辨”派的迷魂阵中出不来。所以我较早地提出,历史的神话化在先,神话的历史化在后,并多次论证,得到同行的回响和支持。

我这一生最遗憾的,也是悲剧性的,是我跟我的导师钟敬文先生,在学术上很少有共同的话语。上世纪50年代中期,当我被迫师从于钟师当研究生时,那时他已放弃民俗学而专搞民间文学,已很有名气,但我却一门心思地想退学。80年代初,又由于各种机缘的巧合,钟师费尽心思,把我从一个编辑部调到 he 身边当他的学术助手。与此同时,我也有机会可以进一所重点大学教现代文学。为了看重师生情谊,我选择了师大民间文学教研室。钟师对我的信任和重视,至今铭记于心,也始终心存感激。然而这跟学术问题毕竟是两码事。当助手期间,出于协助钟师编文集的需要,我系统地学习了钟师的论著,很快得出了一个结论:我的经历、教养、素质和志趣,决定了我不可能成为钟师称职的助手。当时摆在我面前有三条路:一、走,另找跟自己志趣相合的工作,不容易,失去了的机会不可能再得。二、放弃自我,依附钟师,前途可能顺畅无阻。三、走自己的路。这条路阻力大,困难多,要付出代价。最终我选择了第三条路。走向讲台,完全按我自己所设想的思路讲课、研究,开始不断地发表论文并出版著作。

我国民俗学学科恢复以后,钟师的重点由民间文学转向民俗学。我们师生之间的距离便越来越大。我有负于钟师的期待。

在相当一段时期,我被有的人指责为不懂民间文学,他们认为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民间文学走不通,并说“文革”前17年民间文学研究的水平上不去,正是纯粹搞文学研究所致。(对那一段应如何评价,不属于我现在所谈的内容。)他们不厌其烦地强调,民间文学是科学,只有从民俗的角度研究才是惟一可行之路。他们提倡的“多角度研究”,实际是民俗学角度研究的另一种表述话语,并不真正包含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语言学等等。

民俗学有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和价值,但它属于历史学科的范畴,放在文学院(或中文系),已经是因人而设。

有好心的人劝我走。我的不服输的劲,让我由不喜欢搞民间文学,一变而为非搞不可。要改变逆境,除了努力,没有别的路可走。我尽力

排除干扰，埋头著书立说，调动我长期的文化积累，走自己开创的路。20多年，就在这种背景下，我出版了若干著作，发表了100多万字的论文。有好几位我的伯乐，为我发表过多篇论文，但至今我们仍限于文字之交，未能见面。而他们的大名，都深深铭刻在我内心。有的省区的读者，把我已发的论文传抄，再用手抄本的形式流传。有的不认识的读者，给我写来热情洋溢的书信……所有这些，对我的鼓励都是无价的，比著作获奖更令我珍视。我永远为之动情！所以，我把我所尊敬的读者奉为上帝，其中有我的前辈师长、同学、同行朋友、同事、学生，还有那未能谋面的为数更多的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普通人。他们有的已白发苍苍，有的是涉世不深的年轻人。这都是我的支持者、朋友、上帝，是我的衣食父母。没有他们，我难摆脱困境，必然寸步难行。有了他们的热心支持，我才如鱼得水，奋勇前进。尽管每前进一步，步履是那么沉重，障碍是那么多。我深深明白，自己至今也未能达到理想的学术高度，但毕竟我一直在走着，慢慢地行进着。我要对得起我的上帝！对有些固有的常识常理提出质疑，不为俗见所左右，有独立意志，具备慧眼，敢于逆流而上的逆向思维，未必不是步入堂奥的必由之路。

深深感谢我的上帝，我依然一如既往地需要你们的支持和帮助。这本论集是从多年论文中精选出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能隐约看出民间文学学术领域的某些论争，更主要的还是反映了我自己是如何艰难地走过来的，为我20来年的学术活动作一小结。每篇后面都有写作年代，更能看出我的思想发展过程。请允许我用此卷不成熟的文集，满怀激情地作为心灵之礼，敬献给我的上帝。

2005年12月于北京团结湖

社会主义民间文艺学 体系的形成与趋向

一门学科形成和成熟的标志,取决于它是否已经取得独立的学术地位,是否有经典性著作产生,是否已经创造出逻辑严密的、完整的学术体系。用这一标准来衡量我国社会主义民间文艺学,应该承认,正在形成过程中。

作为民间文艺学,除了民间文学理论,还应包括对各类民间艺术的研究。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者,绝大多数仍是只以民间文学作研究主体。所谓“民间文艺学”只不过是约定俗成的名称。

目前,民间文学理论界,正面临一个新时期,其特点是民间文学资料空前地丰富。理论队伍迅速成长壮大,各种相邻学科的突飞猛进,促进了这一学科的发展,也刺激了这一领域的争鸣意识。

纵观我国民间文学的历史轨迹,可说是源远流长;横观则是中西多种思潮的汇合。

我国自周、汉直至明、清,从来就存在两种不同而又有密切关系的民间文学理论传统。一种是以儒家为主的民间文学观,即通过民间文学作品来了解民间的风俗和人民对当代当权者得失的反映,以利于制定政令,更好地贯通上下之情,便于统治。这是从政治出发而强调民间文学的认识价值。另一种是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作家、诗人的民间文学观。他们奉民间文学为乳母,高度评价民间文学的审美价值,继承发扬民间文学的优秀传统,不但致力于搜集、整理、编辑、出版工作,而且在改编、升华、再创作方面,留下了无以数计的辉煌篇章,使民间文学

的艺术光华代代传承。这两种不同的民间文学观，长期并存，互为补充。

中国封建社会文化曾居于世界前列，近代才出现落后于西方文明的局面。但是，近代又是中国保卫民族独立自主的一个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一批有代表性的人物，出于不同的奋斗目标，率先与西方文化相接触。西学东渐的结果，使近代几十年内，成为中外古今文化大汇聚的焦点。资产阶级的思想，是在新旧势力不断争夺、新旧因素反复消长、新旧文化互相渗透的情况下，在社会上产生了启蒙作用。近代知识分子在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启发下，他们之中有的人曾发表过零散的对古神话传说、民歌、民谣、笑话、民间戏曲、民间曲艺等的见解，特别是对神话传说的认识和戏曲的研究，颇有发现。但由于资本主义在中国近代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因而这些见解在学术领域，一般说，是不发达、不完整、不系统、不深刻的。资产阶级学者由于某种思想的触发，或对某个问题研究的需要，而涉及到民间文学的一些体裁，大多数人并不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自觉研究，只不过是其他学术研究的副产品。这些学者在接受了西方的新思想、新科学、新文化以后，尚未及消化，又为了政治斗争的急迫，赶紧用作向封建文化冲击的武器，表现出新兴者的敏感、锐利和勇气。加上中国近代人物都比较复杂，尤其意识形态方面的代表更是如此。伴随他们学术观点的局限，他们对民间文学的见解当然难免偏颇。

尽管近代民间文学理论是零散肤浅的，然而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使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诞生，已经有了预兆，这正是这一学科形成的前奏。

在“五四”新文化的影响和推动下，少数热心于大众文化的知识分子，最初为中国的歌谣学，后扩大为中国的民俗学，其中又包括民间文艺学，作了多方面的、艰苦的探索。当时，我国民俗学者，有的接受的是英国民俗学的影响，有的则受到日本民俗学的熏陶。北京大学《歌谣》周刊责任编辑之一周作人，最初是作为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和世界

文学的译介家活跃于文坛,但他的民间文艺观却倾向于以民俗学为主。在《歌谣》周刊发刊词上,特别强调民俗学的研究是一项重要的事业,歌谣是民俗学的一种重要资料,所以汇集歌谣的第一个目的是为学术,为文艺只是第二个目的。1930年以后,“中国文艺战线上的各种流派各种倾向,经历了复杂的裂变和聚变,终于重新组合为互相对峙的左右两翼,和动摇于二者之间的中间作家之群。”〔1〕鲁迅、周作人这两个曾经并肩作战的兄弟,也分别成为左翼和右翼的领袖人物。这时的周作人开始以精神贵族的姿态挑剔民间文学,并用指桑骂槐的方式讥讽革命作家对民间文学的歌颂。他说:“从前创造社一位先生说过,中国近来的新文学运动等等都只是浪漫主义的发挥,歌谣研究亦是其一,大家当时都为民众民族等观念所陶醉,故对于这一面的东西以感情作用而竭力表扬,或因反抗旧说而反拨地发挥,一切估计就自然难免有些过当……到了现在却似乎更应进一步,多少加重一点客观的态度冷静地来探讨或赏玩这些事情了。”〔2〕多么悠闲的口吻!难道不是对当年《歌谣》周刊精神的背叛和否定。次年,他又说:“……民俗学地治理歌谣故事,我觉得要比较普通那种文学史的一一不自承认属于人类学或文化科学的那种文学史的研究更为正确,虽然歌谣故事的研究当然是应该归文学史的范围,不过这该是人类学的一部之文学史罢了。”〔3〕引用这些话,并不是想利用周作人后期的变化来否定民俗学在我国的影响和历史地位,而是为了说明,当时确有一些学者由于全盘接受外来民俗学,虽然对民间文学作过一些研究,但民间文艺学并未取得独立的地位。他们反对的是民间文学当文学的婢女,却要拉它当民俗学的侍从。因此,他们大部分人都偏重于从科学史的方面去看待民间文学,在资料的选择上重科学而不重艺术。

〔1〕舒芜:“周作人概观(下)”,《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2〕周作人:《看云集·重刊冤裳续谱序》。

〔3〕周作人:《看云集·英吉利谣俗序》。

在二三十年代的民俗学家中,以主要精力研究民间文学的,是至今健在的钟敬文先生。1936年他所写的《民间文艺学的建设》(《艺风》第四卷第一期),已初步提出要把民间文艺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系统的科学。但是,这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民间文艺学并不完全一样,又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艰困,以及从事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学者们本身的诸多局限,这一学科始终只附属于民俗学的范畴。不过,他们所积累的资料,运用的方法和他们的研究成果,如果我们吸收其中可取的成分,作积极的解释,将其与民间文学的审美价值结合起来考察,那么和真理的距离便有可能越来越接近。

1918年至1937年这一段时间的民俗学家,在艰难的条件下,倡导了搜集研究民间文学的风气,留下了值得纪念的业绩。但这一时期的研究,普遍存在附会的考证,繁琐的比较等形式主义的缺陷,甚至发展到对于以文艺的研究为目的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认为“单因为研究文艺的目的去研究民俗,不是民俗学的幸福”。〔4〕对民俗的这种观点,实际也反映了他们对民间文学的态度。

在现代学术史上,第一个深刻认识民间文艺本质并从宏观上把握民间文学的是鲁迅。

鲁迅没有民间文艺理论专著,这是事实。鲁迅对民间文艺的某些具体见解,的确未必永远正确。但是鲁迅不管是对文艺或民间文艺的阐述,都是和当时的思想斗争和革命需要相联系的。他善于剖析传统文化精神的双重性,并用他所处时代的最新意识升华传统文化。作为一位深刻敏锐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视角,从来没有把民间文艺作为孤立的存在。他无暇把玩和猎奇,常常借民间文艺为例,引发开去,抒发他的政治见解和文化观,同时也表达了他的独特的民间文艺观。后期还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来阐明民间艺术的诸问题。鲁迅不同于同时代的民俗学家,他对民间文学的糟粕有清醒的认识;也不同意

〔4〕《民俗》第101期,编者“本刊今后的话”。

革命阵营内部的革命艺术家们片面强调民间艺术的落后性。在这一点，鲁迅超越了他的同时代人。可惜，当时左翼文化阵营内部，对鲁迅的民间文艺观并未真正理解和付诸实践，这是历史的教训。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在面临民族危亡的关头，中国文艺向何处去，应该有什么样的内容，用什么样的形式，怎样使两者更好地结合起来，已经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延安文艺界从1939年初开始，长达一年多关于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讨论，直接影响到国统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不管是延安还是国统区对于文艺大众化的争鸣，中心都是如何正确对待民间文艺，如何将革命文艺与民间文艺相结合。此后，民间专业文艺，民间文艺作为艺术作品的功能，受到空前未有的重视。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的“结论”部分的讲话，在中国思想史和艺术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形成也是历史的转折。这主要表现在从那以后，我国真正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创新和研究工作。虽然，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开展这几方面的工作，是在建国以后。正因为《讲话》是立足于整个革命文艺运动来解决文艺工作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些根本问题对我国今后的民间文艺工作同样重要。

《讲话》后，席卷解放区的如火如荼的新秧歌剧，出现了建国前民间文艺发展史上最光辉绚丽的一页。民间文艺形式是在那一特定历史条件下革命新文艺的最佳表现形式，革命文艺又使民间文艺恢复了青春。它们相辅相成，终于出色地完成了文艺大普及、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化的神圣的历史使命。从延安的经验完全证明，推陈出新对民间文艺是完全适用的。从此，民间文艺不再仅仅是少数学者的资料，只要利用得当，便可以促进新文艺的发展，并成为新文艺的一部分。这正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观与西方传统民俗学的民间文艺观的原则区别。在民间文艺的土壤上能培养出革命的文艺，这是过去的学者所不可想像的。

当然，由于环境的不安定，40年代解放区的民间文艺活动重实践多，不可能坐下来作精深、细致的理论探索，但解放区在民间文艺方面